

贸易预期与大国冲突前景

——评戴尔·科普兰《经济相互依赖与战争》

胡 然

内容提要：经济相互依赖会导致国家间的战争还是和平？戴尔·科普兰在《经济相互依赖与战争》一书中提出了贸易预期理论。具体来说，在甲乙两国不对称依赖的情况下，战争的可能性取决于依赖性较强的乙国。如果乙国对未来贸易的预期是乐观的，则其会对其总体安全形势有信心，进而更可能采取合作政策；如果乙国对未来贸易的预期偏悲观，其就会担忧其长期安全前景，则更可能采取强硬政策或诉诸战争。科普兰指出，驱动国家行为的贸易预期是动态变化的，主要取决于外部总体安全环境和甲乙两国的外交互动。科普兰细致研究了1790年至1991年大国政治与军事冲突的所有主要历史案例，该研究彰显了贸易预期理论相对于自由主义和经济现实主义更强的解释力和显著性。这部著作丰富了国际关系理论探索与争鸣，既在理论建构和研究方法上启发思维，也引发了对具体逻辑演绎和历史案例研究的辩论。

关键词：经济相互依赖 大国间战争 未来贸易预期 “贸易-安全困境” 经济现实主义

经济相互依赖会导致国家间的战争还是和平？这是国际关系领域一个经久不衰的核心议题，引发长期的观点争鸣。两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观点恰恰相反。自由主义的论证逻辑围绕机会成本，认为国家间相互依赖程度越高，越容易走向和平，越不可能发生战争；现实主义的论证逻辑围绕脆弱性，认为相互依赖会增

胡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加国家的安全担忧,进而提高发生军事冲突和战争的可能性。自由主义者和现实主义对这个问题的唯一共识,或许是历史事实并不完全支持过度简单的观点。

戴尔·科普兰(Dale Copeland)认为,以上两种观点都有道理,但都不够明确,没有具体说明在何种条件下可能成立。在科普兰看来,现有研究没有很好地回答一系列重要问题:大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它们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为什么大国间能保持长期的和平贸易,又为什么有时一些国家还是会转向强硬政策?各国间的贸易投资纽带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会带来和平,或引起军事冲突?因果变量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在《经济相互依赖与战争》(*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¹一书中,科普兰试图打破自由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各执一词的僵局,想要解决两种观点各自的演绎推理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的根本矛盾。科普兰将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出于安全考虑的预防性战争问题结合起来,对“依赖性”重新进行界定和操作化,引入“预期”这一动态变量,提出了一种动态演绎理论——贸易预期理论(trade expectations theory),寻求全面地回答上述问题。

一、贸易预期理论的核心观点与演绎逻辑

(一) 基本假定与核心因果假设

贸易预期理论的基础,是看待国际问题的(新)现实主义取向。该理论假定国家的主要动机是安全最大化,而非推进福利、增强社会凝聚力、赢得荣誉等其他目标;也假定国家是理性的单一行为体,各国领导人享有国内自治权。²但不同于新现实主义认为大国原本不想相互贸易的观点,科普兰基于历史和现实指出,要维持强大的军力,国家就必须拥有不断增长的经济,这促使国家开展贸易,以追求长期的权力地位来确保安全。

与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一样,贸易预期理论的演绎逻辑也围绕单个国家管理自身依赖性的努力而展开,重点讨论两个行为体(甲国和乙国)不对称依赖的情况,分析焦点是解释依赖性较强的乙国的行为。³该理论认为,在两国之间,战争的可能性取决于乙国的行为是温和还是强硬。在现实主义观点的基础上,贸易预期理论提出,影响乙国政策的是其对总体安全形势的评价,最重要的是对其在国际体系中长期权力地位的评估。

1 Dale C. Copel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美]戴尔·科普兰:《经济相互依赖与战争》,金宝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2 这两个主要假定都与自由主义有本质分歧。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追求的是绝对物质收益,并注重国内政治因素。

3 假定了不对称,就说明贸易环境的变化更容易影响依赖性较强的乙国关于和平或冲突的决策。

科普兰摒弃对相互依赖和战争的静态比较理论,¹转向动态理论,把未来纳入核心演绎逻辑。根据贸易预期理论,乙国在做决策时,不能只考虑其依赖程度(dependence level),也必须计算对未来贸易的预期(expectations of future trade),即把未来保持和平贸易的总体预期价值与选择战争或冲突的价值相比较。科普兰认为,在大国关系中,经济相互依赖和关于未来贸易投资的预期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关键的推动力,能够决定大国间发生战争和冲突的概率。

科普兰将乙国的依赖程度操作化为通过贸易获得的利益(与自给自足相比)与专门化后贸易中断带来的成本(与自给自足相比)之和。进行贸易的利益和贸易中断的代价本身,并不能反映对未来贸易的预期价值。科普兰认为,对未来贸易的预期价值应在贸易利益的价值与贸易中断的代价之间的区间内,具体值取决于国家预计保持开放贸易和贸易中断的可能性有多大。即使当前贸易额很高,但因对未来贸易的期望值很低,预期贸易价值也可能是负的。

如果乙国关于未来贸易的预期很乐观,那么乙国就会对其安全形势有信心,也就更容易采取合作政策,避免冲突和战争。如果乙国关于未来贸易的预期越悲观,它就越会对长期安全前景感到担忧,因而更可能选择强硬政策或全面开战。乙国不再相信体系对己有利,反倒有理由认为,目前得不到的资源、投资和市场,能够通过打一场预防性战争或采取强制性政策来获得。

可见,预期变量有助于确定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预言可能成立的条件。贸易预期理论既能解释大国为何会逐渐相互依赖,并能多年保持和平贸易、不打仗,又能解释为什么有时一些国家会转向强硬政策。那么,国家对未来贸易的预期是如何变化的呢?

(二) 动态演绎逻辑:“贸易-安全困境”下的未来预期变化

贸易预期理论的演绎逻辑带有新现实主义色彩,但它排斥进攻性现实主义关于国家必须根据最坏情况做打算的悲观论调,认为国家需要在相对收益和脆弱性之间进行利弊权衡。借鉴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军事-安全困境”,贸易预期理论提出“贸易-安全困境”(trade-security dilemma)。简单来说,一国在体系周围投射力量,以保护本国商业贸易的行为,可能被视为具有侵略性,让其他国家感到害怕因而对其加强经济限制,于是这些国家进入“行动-反应”的恶性循环。出于对这种困境的预期,领导人倾向于实行谨慎温和的对外政策,与他国不断开展贸易。

但是,这也引出了另一个难题:为什么大国明知可能出现战争的危险,还是可能陷入“贸易-安全困境”?大国为何并不总是伸出商业利益的胡萝卜,以降

¹ 科普兰指出,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研究方法进行预测的依据,只是国家在某个时间点的依赖程度,难以充分解释各种历史事例。

低发生战争的可能性?相互贸易的各国为何往往不能达成合作协议,从而有助于避免大国战争?科普兰指出,国际政治并不只是静态应对关键经济与权力预期趋势的问题,也是不断讨价还价的互动博弈。

驱动国家行为的贸易预期并不完全取决于外部总体商业环境,还可能受到外交互动的影 响。一方面,甲国的行为(尤其是对乙国的贸易政策)起到信号(signaling)作用,有助于乙国对未来的贸易-安全形势做出评估。如果甲国表达愿意继续维持高贸易水平,这会使乙国提高预期贸易价值,降低发起冲突的意愿;反之亦然。另一方面,乙国的行为(即外交政策的侵略性程度)会影响甲国对其性格类型(即温和还是怀有敌意)的评价,进而影响甲国是否愿意承诺将来与乙国贸易。如果甲国领导人对乙国性格做负面评价,就可能开始限制乙国获得资源、投资、市场的途径,进而容易引起贸易安全形势的不断恶化。

但这种互动并非只是承诺问题,在不完全信息下猜测对方国家的未来意图,即现实中的“未来问题”(problem of the future)不确定性更强。两国还面临对方国家因领导层变动而造成的国家意图和行事风格的变化、重要第三方国家未来的国内稳定性和行事风格问题。这些是甲乙两国的政治精英都无法控制的外源性因素。

作为追求安全最大化的理性国家,乙国只会根据乙国外部条件或甲国行为的变化,调整对未来的乐观或悲观预期,进而改变行为。促使乙国转向强硬政策的一种可能是,乙国发现总体贸易环境已经不再有利。另一种可能是,甲国变得不能或不愿对乙国开放贸易,从而引起贸易安全形势不断恶化,可能使两国陷入冲突。而甲国对乙国保持自由贸易的能力和意愿,受以下六个因素的影响:担忧乙国对第三方大国有所企图;小国内乱,甲国需要干预;第三方大国对小国有所企图,迫使甲国采取行动;甲国对乙国的总体经济增长感到恐惧;甲国关键原料消耗殆尽,需要在别处争夺未来对这种资源的控制权;甲国立法部门阻挠行政部门的经济政策。

这些外源因素或单独或共同对战争的爆发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些因素破坏贸易前景,使乙国领导人认为,只能靠自助行为来解决贸易关系恶化和国力衰退的问题。当乙国方领导人不但对未来抱有悲观预期,而且认为造成这种预期的原因是既定的(即无力改变的),那么他就更可能认为战争是害处最小的理性选择。

二、研究方法:对国际关系中稀有事件定性研究的新方法

危机和战争的肇始是国际关系中的稀有事件,一般是在具体时空处境下一系列复杂因素同时作用才会发生的情况。科普兰指出,过去30年关于经济相互依赖与冲突的主流研究方法——大样本定量分析,并不适合解释多重并发的复杂因

果关系 (complex conjunctural causality)。虽然这种实证分析逐渐复杂化, 一些学者引入了附加交互变量 (如政权类型、发展水平、合同强度等), 但其仍只能揭示出变量间的共变相关性, 不能解释这些因素是如何单独或共同产生因果效应的, 对其进行解释尚需演绎理论。

就贸易预期理论而言, 如果使用定量方法, 就需要用其他指标数据来代替预期变量, 只集中分析当前与过去数据的简况, 这么做最终并不能解释领导人是如何考虑将来的。探究领导人预期的最佳方法是对档案材料进行细致的过程追踪。但在理论建构和检验上, 定性案例研究一般又存在选择偏倚 (selection bias) 和缺乏可概括性 (generalizability) 的问题, 并不比定量研究更胜一筹。

科普兰想要超越定量和定性研究中围绕单个变量或单个变量组合的了无新意的争论, 放弃寻找对稀有事件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解释 (a single “master explanation”)。他认为, 在思考多重复杂因果关系时, 必须考虑导致危机/战争爆发的多种路径。科普兰转而考察相互竞争的不同理论, 研究推动稀有事件发生的各种变量组合 (competing bundles of variables), 提出对国际关系中稀有事件定性研究的新方法。¹

具体来说, 科普兰详细研究了1790年至1991年大国政治与军事冲突的全部主要案例, 以避免定性案例研究面临的选择偏倚, 同时检验了理论在不同时空背景的适用度。这种方法不仅能解释近期大样本量化分析的相关性结果, 而且可以解读近代外交的大量史实, 呈现带来和平或导致战争的因果机制。在细致的案例研究中, 科普兰区别了各种因素——推动 (propelling)、促进 (facilitating)、制约 (constraining) 或强化 (reinforcing) 的不同功能作用, 分析了主要理论提出的核心自变量如何与其他辅助因素相互作用, 最终促进了和平或导致了冲突。

这些案例研究不仅旨在检验贸易预期理论的逻辑, 还寻求检验外交史上各种因果要素和变量组合的相对重要性。作者通过考察在导致危机和战争爆发的复杂因果关系中, 与经济相互依赖关联的变量、贸易预期理论的变量发挥关键因果作用的频繁程度有多高, 彰显了贸易预期理论相对于另外两种主要理论 (即自由主义和经济现实主义) 的解释力 (force) 和显著性 (salience)。

三、案例选择与界定

在案例选择上, 科普兰只研究大国间的战争和危机。这一方面是出于实际考虑, 为了限定稀有事件的数量, 确保案例相关档案材料的可获得性; 另一方面是出于理论考虑, 因为本书探讨的所有理论都基于无政府状态假设, 按照该假设, 较小国家的行为会受大国的影响和制约, 所以小国案例不能提供可靠的检验。

1 [美] 戴尔·科普兰:《经济相互依赖与战争》, 第85—94页。

科普兰选择1790年至1991年这个时间范围,是为了做“困难案例检验”。因为该时间段关于经济相互依赖与战争的案例很有利于自由主义理论,不太利于经济现实主义和贸易预期理论。如果案例分析结果更支持后两种理论,而非自由主义,那么后两种理论则经受住了“困难案例”的考验,就更站得住脚。

在案例界定上,科普兰没有把每次危机或战争当作单个案例来处理,而是将200年战争与和平的历史划分出多个案例时期(case period)。案例时期必须以涉及不同的大国、特定的突出问题或者独立的重要事件为标志,包括危机或战争爆发前大国逐渐走向紧张的酝酿阶段。例如,1803—1815年的一系列大国战争被看作同一个案例时期,因为这些战争的首要原因都是拿破仑时代法国的霸权志向。再如,1943—1945年被分为两个案例时期,一是1943—1944年美苏针对控制伊朗石油的争端,二是1943—1945年美苏关于战后欧洲秩序的斗争,因为两者的地区重心不同。

依据此标准,科普兰共确认出40个案例时期,并用了六章(400余页)的篇幅进行详细阐述。第三章聚焦于1890—1939年,主要案例有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德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第四章聚焦于1905—1940年,将1905—1937年日本发动的多次侵华战争分为3个案例时期。第四章末尾和第五章详细论述了1938—1941年美国努力阻止日本进攻中苏的贸易限制如何导致日美关系恶化以及最终日本偷袭珍珠港并引发太平洋战争。

第六章概述1942—1991年冷战的起源、动态和结束,列举了11个案例时期:1943—1944年苏联和美国关于控制伊朗石油问题的冲突,1944—1945年美苏冷战的起源,1945—1946年伊朗危机,1946—1948年第一次柏林危机,1948—1950年朝鲜战争,1950—1953年美国颠覆伊朗政权,1954—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1956—1962年美苏全球战略不稳定性、第二次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1963—1974年美苏逐渐走向缓和,1975—1983年美苏关系再度紧张,1984—1991年美苏关系缓和直至冷战结束。或许是因为美苏两国并未在越南战争、苏联入侵阿富汗问题上发生直接冲突或剑拔弩张的军事危机,科普兰没有论及这两场重大战争。

第七章和第八章主要论述19世纪的欧洲国家间的战争和危机。第七章从1790—1801年法国大革命后的欧洲大战讲起,直到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划分了10个案例时期,包括鸦片战争。第八章将19世纪下半期的欧洲大国政治划分为11个案例时期,包括意大利统一战争、普奥战争、普法战争、法德危机、英俄危机,还有5个案例涉及法、英、德在非洲的争端和危机,以及美英围绕委内瑞拉边界问题的危机。

四、案例分析和理论检验

科普兰借鉴主流的档案材料和研究文献,围绕自己的核心疑问并比较不同理论的分析框架,筛选史料、组织关键证据,对每个案例时期进行历时性阐释,论述大国之间的互动、外部环境和各种第三方外源性因素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大国的贸易政策以及对未来贸易预期变化的影响,进而促使它们采取强硬或缓和措施。对于领导人对未来贸易前景的预期这一核心自变量,科普兰没有按照最初操作化的价值区间进行评估,只是运用档案材料来描述乐观还是悲观,也没有提出一致明确的标准来说明预期悲观到何种程度才会引发冲突。

科普兰的研究发现,在40个案例时期中,经济相互依赖在30个案例时期起重要作用;在其他10个案例时期里,非商业变量具有因果突出性,国际贸易或金融变量没有推动相关冲突或危机事件的发生。他由此指出,经济相互依赖在近现代大国冲突中的作用远高于此前普遍认识到的程度。

在肯定经济相互依赖与战争之间因果相关的30个案例里,有26个(86.7%)支持贸易预期理论,例如1801—1815年拿破仑战争、1904年日俄战争的爆发、1914年德国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1950年之后的所有美苏冷战案例。有11个案例(36.7%)支持经济现实主义,例如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只有3个案例(10%)支持自由主义观点,包括俄国缓和1839—1849年东方危机、俾斯麦在1883—1884年决定转向帝国主义、20世纪20年代末日本对中国东北保持克制。

在这30个案例中,有14个案例只单独用贸易预期理论就能给出有力解释,有9个案例验证出贸易预期理论的逻辑至少和经济现实主义一样显著。科普兰由此指出,贸易预期逻辑比其他理论更有解释力。

基于40个案例研究,科普兰还指出,在世界历史浪潮中,系统变量和安全担忧是压倒一切的,比单位层次的变量更具显著性。科普兰对自由主义的解读是,自由主义者认为必须依靠国内层次或个人层面的因素,才能解释什么促使行为体发动战争。¹但科普兰的研究发现,很少有案例表明当贸易下降时,有利于冲突的国内因素会起到直接推动或促进作用。

五、对本书的评价

(一) 贡献与特点

《经济相互依赖与战争》堪称一本巨著——科普兰提出宏大的问题,构建宏

1 [美] 戴尔·科普兰:《经济相互依赖与战争》,第42—43页。

观理论,并用200年间所有大国冲突的详尽历史案例进行理论验证和比较。在国际关系学科的研究日益专门化、精细化、科学化的当下,这种努力彰显出作者难能可贵的勇气和学术视野。这本巨著的问世更要归功于作者笔耕不辍的勤奋研究和思想积淀。从1996年春科普兰在《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上第一次发表有关经济相互依赖与战争的文章¹到2015年出版这本英文专著,历时约20年。

在关于经济相互依赖与战争/和平的理论探索和争鸣中,此著作具有里程碑意义,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这一议题的研究议程。科普兰在理论逻辑演绎、研究方法和具体案例论证中,都有意识地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保持对话,比较考察

科普兰不止步于追求单个变量或单个变量组合之间的因果相关性,而是基于对200年间40个案例时期的细致定性研究,来探究复杂因果机制。科普兰将演绎逻辑和因果机制阐述得清晰透彻,将历史案例研究得详尽且厚重,更容易引起跨学科的建设性学术辩论。

不同理论的解释力和显著性,致力于弥合现有理论的演绎逻辑,解答学术辩论的焦点和棘手难题。虽然其他学者也曾指出经济相互依赖对战争的影响很可能取决于某些条件,²但科普兰的贸易预期理论对这些条件的论述最为全面。

科普兰寻求融合不同国际关系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尝试也值得借鉴。在大样本定量分析研究方法大行其道之时,科普兰不止步于追求单个变量或单个变量组合之间的因果相关性,而是基于对200年间40个案例时期的细致定性研究,来探究复杂因果机制。也正因为科普兰将演绎逻辑和因果机制阐述得清晰透彻,将历史案例研究得详尽且厚重,他的研究才更容易引起跨学科的建设性学术辩论,而限于国际关系学、政治学、外交史和国际政治经济学范畴。³

科普兰的贸易预期理论也启发着后续理论探索和研究方

1 Dale C. Copel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A Theory of Trade Expect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4, Spring 1996, pp. 5-41.

2 参见Havard Hegre, "Development and the Liberal Peace: What Does It Take to Be a Trading Stat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000, Vol. 37, No. 1, pp. 5-30; Christopher F. Gelpi and Joseph M. Grieco,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the Democratic State, and the Liberal Peace," in Edward D. Mansfield and Brian M. Pollins eds.,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New Perspectives on an Enduring Debat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3, pp. 44-59; Michael Mousseau, "The Social Market Roots of Democratic Pea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09, Vol. 33, No. 4, pp. 52-86.

3 美国政治学会在2015年的年会上专门组织了一场主题为“经济相互依赖与战争”的研讨会。对该著作的诸多英文书评参见: Daniel W. Drezner,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by Dale Copeland (review),"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17, No. 3, Summer 2015, pp. 228-231; Harold James, "Book Review: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By Dale C. Copel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1, No. 3, 2015, pp. 641-642; Jack Snyder, "Trade Expectations and Great Power Conflict —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0, No. 3, Winter 2015/2016, pp. 179-196; Erik Gartzke, "Book Review,"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31, No. 1, Spring 2016, pp. 170-171; Joseph M. Patent, "Book Review,"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14, No. 2, June 2016, pp. 594-595.

法的发展。例如,在科普兰更侧重结构层次研究的基础上,后续理论探索或可尝试将国内政治因素纳入因果机制的考量。再如,为避免科普兰定性研究的选择偏倚问题,两位欧洲学者对两国间的地理不对称性和资源不对称性进行量化分析,用以测量两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对冲突概率的因果性影响。¹

科普兰的贸易预期理论对探讨中美关系的前景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与时下流行的“修昔底德陷阱”论调形成鲜明对比,为两国政策圈和智识界提供了更复杂微妙的思维视角和更积极务实的政策思路。科普兰在书中指出,“或许除了台湾问题之外,可能导致中美关系恶化的一大因素就是中国不断增强的经济依赖性,但吊诡的是,这个因素也是最有可能维持和平的。在未来二十年中,一切将取决于双方如何出牌,以及双方的政策对各自关于未来经济环境的观点有何影响”。²的确,自2017年以来,中美经贸关系从双边关系的“压舱石”迅速演变为两国博弈焦点,贸易往来与科技竞争被日益“泛安全化”,两国陷入了“贸易-安全困境”。诚如科普兰所言,如果两国领导人能以史为鉴,以贸易预期理论为鉴,他们应该能采取措施,巩固彼此的正面预期,避免可能引起危机和战争的失误。

科普兰的贸易预期理论对探讨中美关系的前景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为两国政策圈和智识界提供了更复杂微妙的思维视角和更积极务实的政策思路。

(二) 几点思考与疑问

科普兰的这部论著也存在一些令人疑惑的问题和偏颇之处。首先,在概括现实主义学派和自由主义学派对经济相互依赖与战争的主要观点时,科普兰似乎有“定制稻草人”的嫌疑。本书中的经济现实主义,是科普兰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核心逻辑中推导出来的。科普兰反对进攻性现实主义过度悲观的论调,但很大程度上借鉴了防御性现实主义,来发展和演绎贸易预期理论。那么,在经济相互依赖与战争的议题上,是否存在多个不同的现实主义观点,是否还能推导出防御性经济现实主义呢?

科普兰对自由主义观点的理解突出了是否存在国内利益集团或其他国内因素对战争或和平政策的推动,而弱化了更重要的自变量——政体类型。科普兰指出“民主和平其实是经济和平”³,或者说是“资本主义和平”⁴,或许是为了将理论对话框定在经济相互依赖之下。但是,对“民主和平论”的轻视突显作者在案例研究中“根据因变量选择”的偏倚。

1 Massimo Morelli and Tommaso Sonno, “On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55, No. 3, September 2017, pp. 1084-1097.

2 [美] 戴尔·科普兰:《经济相互依赖与战争》,第507页。

3 [美] 戴尔·科普兰:《经济相互依赖与战争》,第72页。

4 [美] 戴尔·科普兰:《经济相互依赖与战争》,第77页。

其次,科普兰对核心自变量——国家(领导人)对未来贸易的预期的界定和测量不够明确,给定性案例分析留下过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以自圆其说。科普兰假定国家是单一理性的行为体,将国家对未来贸易的预期视为系统层次变量,认为其主要是由外部环境和他国行为决定的。然而,在很多具体案例研究中,科普兰更多强调外部不确定性对预期的影响,但没有说明明确的结构原因,只是依据史料论述领导人是否以及如何认知贸易降低的严重性。

作者虽能选择性地运用史料自圆其说,但不能证明领导人对未来贸易的预期没有受到国内政治生态、社会心理、个人主观信念、政治或组织意识形态等单元层次因素的影响。例如,科普兰指出,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使日本对未来贸易持悲观预期,进而促使其对外进行军事扩张以获得资源和市场,¹但却忽视了日本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对贸易预期理论和战争行为的影响。如果使用反事实推理,结论很可能是日本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和国内政治比贸易预期更具解释力。

在对预期价值的测量上,科普兰也没有解释清楚什么程度的悲观贸易预期会促使领导人发起冲突或战争。诚然,不同时空处境下的案例会存在差异,而且“贸易-安全困境”的恶性循环是缓慢累积地发挥作用。但是,这种测量上灵活模糊的处理,会削弱贸易预期理论的说服力;科普兰在一些案例中似乎又简单地采纳了进攻性现实主义关于国家“做最坏打算”的决策思路。例如,科普兰指出,1904年日俄战争的根本原因是,俄国向中国东北和朝鲜不断进行经济渗透,无意与日本达成协议,日本在外交努力无效的情况下,决心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²但是,没有历史证据显示俄国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预期贸易价值高到值得它打一场危及其在欧洲权力地位的战争。³

最后,除了在案例选择上的“因变量偏倚”,科普兰在一些案例分析中为了自圆其说,轻描淡写国内政治因素对战争爆发的重要推动作用。比较明显的案例除了1904年日俄战争和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还有德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20世纪初至1914年前,英国并没有限制对德贸易,反而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德国对英国的贸易顺差持续增加。⁴如果不是德国自己的对外挑衅行为,德国对未来贸易的预期本应该是正面的。客观来讲,外部经济和军事形势并不要求德国对法国、俄国或英国采取好战政策,一战之所以爆发其实是德国国内民族主义和得势又好战的军队在作祟。

科普兰将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归结为希特勒追求经济安全的理性选择,将希特勒的性格和纳粹意识形态视为强化因素。⁵但是,几乎所有现代学

1 [美] 戴尔·科普兰:《经济相互依赖与战争》,第178—207页。

2 [美] 戴尔·科普兰:《经济相互依赖与战争》,第112—139页。

3 Jack Snyder, “Trade Expectations and Great Power Conflict — A Review Essay,” pp. 192-194.

4 Jack Snyder, “Trade Expectations and Great Power Conflict — A Review Essay,” p. 189.

5 [美] 戴尔·科普兰:《经济相互依赖与战争》,第152—163页。

者都强调纳粹意识形态的决定性因果作用。1939年，德国在欧洲大陆（尤其是欧洲中部和东南部）已占据经济主导地位，发动战争只会威胁而非加强其既有经济权力地位。¹

正如科普兰在序言中所说，《经济相互依赖与战争》层次丰富，可从不同角度阅读；该书讨论了200年的大国关系历史，不同读者阅读该书的方式也可以不尽相同。笔者在阅读该书时，关注国际关系理论和政治学，也怀着敬畏的心情阅读详尽的历史案例。但笔者由于对外交史的掌握远远不及科普兰教授，所以尚不能全面地评价其对每个案例的分析。毫无疑问，在理论建构、案例研究和实证思考上，这都是一本启发思维、常读常新的书。

1 Harold James, "Book Review: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By Dale C. Copeland," p. 641.